ChinaXiv合作期刊

心理科学进展　2023, Vol. 31, No. 8, 1541–1552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202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3.01541

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三分框架与本土概念视角下的比较*

魏新东[1,3]　张凯丽[2,3]　傅绪荣[4]　汪凤炎[2,3]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南京 210044)
([2]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3]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南京 210097)
([4]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 南京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研究院, 南京 210013)

摘　要　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虽都较重视个体行为应尽量符合社会期望及相应的社会文化规范, 但它们有诸多差异。"尊严−荣誉−面子"三分框架下荣誉文化的自我价值来源包括同等重要的自我认知与他人评价, 而面子文化以他人评价为主; 荣誉文化社会等级结构不稳定, 讲究竞争、暴力与美德并重, 面子文化社会等级较稳定, 讲究谦虚、和谐与合作。本土概念下荣誉中自我形象与社会形象相对一致, 包括道德、性别与家庭荣誉等维度, 会以暴力手段捍卫荣誉; 面子中自我形象与社会形象通常不一致, 主要包括道德与社会成就, 表现为挣面子与避免丢面子两个维度, 注重彰显地位与维护权威。在此基础上, 从都较重视社会规范的"理一"视角出发, 将两个文化的"分殊"之处归为社会文化规范的道德化与工具化, 并基于此提出两点展望: 改善测量工具; 探究不同文化变迁内容对社会规范道德化和工具化的影响。

关键词　集体主义, 荣誉, 面子, 社会规范, 文化差异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在文化心理学领域, 研究者大多以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二元对立式理论框架进行东西对比, 面子文化与荣誉文化同被视为集体主义文化, 很少对它们进行系统比较(Boiger et al., 2014; Hofstede, 1980; Markus & Kitayama, 1991; Uskul et al., 2013; Vignoles, 2018)。对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进行系统比较, 一方面有助于将"参照物"从西方社会转移到文化心理学较少关注的环地中海、中东等地区, 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开展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 人们需要跳出自身所处文化环境, 才能更好认识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Oyserman, 2017), 如最早就是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明恩溥(1998)意识到中国人面子的特殊性。以同被视为集体主义的荣誉文化为参照, 可发现在二元对立式的中西方文化比较中易忽略之处, 进一步促进面子文化和荣誉文化的本土研究。

Leung 和 Cohen (2011)主要基于不同自我价值来源与社会结构, 提出具有不同文化逻辑的三种"理念型" ("Ideal type"; Weber, 1997)文化症候, 即尊严(dignity)文化、荣誉(honor)文化与面子(face)文化的三分框架理论。该框架突破了以往在跨文化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二分框架研究模式, 为研究常被忽略的中东、南亚及南美等地区的文化心理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同时, 该框架采取"文化×个体×情境"的交互取向(Culture × Person × Situation approach; CuPS), 为同时考察情境因素、文化内个体差异和文化间群体差异提供了整合视角(Aslani et al., 2016; Leung & Cohen, 2011)。依据该框架, 相较于尊严文化,

---

收稿日期: 2022-09-27
*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6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971014, 62272236); 2020 年度江苏省第五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科研资助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22SJYB0182)。
魏新东和张凯丽并列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 汪凤炎, E-mail: fywangjx8069@163.com

chinaXiv:202310.00188v1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2310.00188v1

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中法律效力均较低，且两者都较重视文化群体中社会和他人的看法，而社会规范主要反映社会和他人的期望，也是法律效力较低环境中约束行为的主要力量，这造成两种文化都较重视个体行为应尽量符合相应社会文化规范(Cialdini et al., 1991; Stamkou et al., 2019)。因此，研究者往往采用两个文化中具体文化规范开发测量工具，其中测量荣誉文化的题项以注重家庭声誉为主，测量面子文化则以注重内群体和谐为主(Aslani et al., 2016; Krys et al., 2017; Leung & Morris, 2015; Yao et al., 2017)。

三分框架从各自文化内具有"家族相似性"(Wittgenstein, 2009)的核心概念群中分别选取尊严、荣誉与面子作为标签，未深入考察作为与特定文化历史脉络高度契合的本土相关概念在各自文化的具体内涵及文化实践(杨国枢 等，2008)，例如，面子文化虽注重内群体和谐，但包括价值性和谐与工具性和谐两种不同和谐观(Leung et al., 2002)，且面子文化在某些情境下对家族声誉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荣誉文化(Smith et al., 2021)。作为本土概念，荣誉概念最早是人类学家对环地中海区域文化特征的概括(Pitt-Rivers, 1965)，心理学者也对荣誉文化中荣誉的内涵与维度进行一系列细致研究与跨文化比较(Rodriguez Mosquera et al., 2002; Uskul et al., 2019; Uskul & Cross, 2019)；面子概念则首次由胡先缙从社会科学角度对其内涵进行研究(Hu, 1944)，随着本土化意识的增强，中国学者已从社会心理学、管理学、营销学等角度对面子进行细致探讨(Ho, 1976; Hwang, 1987; 王轶楠，杨中芳，2005; 佐斌，1997; 翟学伟，2013; 马蓓 等，2018; 汪凤炎，2019, pp. 479−547)。下文将综合上述两种视角系统比较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首先比较三分框架下两个文化的划分依据及文化实践，然后比较作为本土概念的荣誉与面子的内涵、维度及文化实践，在此基础上，从都较重视社会规范的"理一"视角，将两种文化的"分殊"之处归为社会文化规范的道德化与工具化，以期对三分框架下的比较起到一定补充，最后提出两点展望：进一步优化目前采用社会文化规范的题项来区分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的测量工具；探究文化变迁的不同内容对社会规范道德化和工具化的影响。

2　三分框架下的相关研究及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的比较

2.1　三分框架下的相关研究

三分框架主要从自我价值来源与社会结构两个方面来划分尊严文化、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Leung & Cohen, 2011)。作为一种现代性意识(modern consciousness; Berger et al., 1973)，尊严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与他人无关的、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并且这种自我价值没有高低贵贱之别(Ayers, 1984)。尊严文化同时配有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与强力有效的法律体系，让个体能够更加注重内在价值(Miller, 1993)。荣誉文化的自我价值除了来源于个体对自身的评价与认知外，还要他人认可自我声称的"荣誉"；如果他人不认可，则实际上并不具有荣誉。结果，个体自身内在评价与他人外在评价对自我价值均重要(Leung & Cohen, 2011; Pitt-Rivers, 1965)。产生荣誉文化的社会生态主要特征多为资源匮乏、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或基本缺席，人们在这种环境中不得不采用暴力来保护自己及财产，因此，荣誉文化多将以暴力来维护自身地位视为一种合理的社会规范(Schneider, 1971; Uskul & Cross, 2020)。面子文化的自我价值来源虽也包括自我认知与他人评价，但和荣誉文化不同，两者对于自我价值而言并非都很重要，而是主要以外在评价为主(Leung & Cohen, 2011)。面子文化的社会结构主要特征为等级结构稳定且严格，个体需要展现具有合作性的谦逊品质而不是侵略性，以避免破坏系统的稳定与和谐(Ho, 1976; Leung & Cohen, 2011)。

三分框架主要建立在前人用荣誉文化解释美国南北方暴力行为差异的研究基础之上(Cohen et al., 1996; Nisbett & Cohen, 1996)。虽为三分框架，但主要还是为凸显与解释为何暴力行为在荣誉文化中更为常见与受到包容，且只有荣誉文化中暴力与美德呈现正相关等两个主要现象(Cohen & Leung, 2012; Leung & Cohen, 2011; Hernandez et al., 2022)。美国南方倾向荣誉文化，美国北方倾向尊严文化，使得美国南北方在暴力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如历史档案中的谋杀犯罪率、暴力节目收视率、各州法律和社会政策以及问卷调查与实验室情境研究等，均揭示美国南方发生更多与荣誉威胁相关的暴力事件，美国南方对维护荣誉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2310.00188v1

的暴力犯罪也更宽容; 美国南方还存在更严重的亲密关系暴力、校园暴力及对自身暴力(自杀)等问题(Nisbett & Cohen, 1996; Uskul et al., 2019; Gul et al., 2021)。荣誉相关的暴力行为还通常伴随以愤怒与羞愧为主的情绪反应(Uskul et al., 2019)。具体而言, 荣誉文化中个体遭受冒犯、侮辱或诬告时, 会感到愤怒; 羞愧则主要来自个体行为违背荣誉守则(Nisbett & Cohen, 1996; Uskul et al., 2019)。不同荣誉感被试愤怒时行为表现无显著差异, 越愤怒越倾向选择惩罚侵犯者, 但羞愧不同, 低荣誉感被试越羞愧越会退缩与回避, 高荣誉感被试则是越羞愧越倾向选择惩罚(Maitner et al., 2022; Rodriguez Mosquera et al., 2008)。在跨文化比较中也有类似现象, 在荣誉文化中, 羞愧与愤怒呈正相关, 在非荣誉文化中, 羞愧与愤怒呈负相关(Uskul et al., 2019)。

荣誉文化中暴力与美德也呈正相关, Leung 和 Cohen (2011)发现当用暴力影片启动荣誉文化, 美国南方被试在后续记忆测验中更正直, 更少作弊, 而分别代表尊严文化与面子文化的美国北方被试和亚裔群体, 观看暴力影片与否并不影响其在后续测验中表现, 并且两种文化中被试越倾向暴力, 越会作弊。可能是为预防暴力可能带来的无休止报复, 荣誉文化孕育出礼貌友好的社会规范(Cohen & Vandello, 2004)。当不存在荣誉威胁时, 荣誉文化下个体更加友好, 如研究发现荣誉意识与竞争性冲突意图呈负相关, 当启动荣誉意识时, 个体会倾向选择更加包容和更少支配性的冲突处理策略(Harinck et al., 2013)。暴力行为看似与礼貌友好不相容, 研究者指出荣誉文化中礼貌可能是为掩盖愤怒, 拒绝了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 最终导致暴力行为(Shafa et al., 2015)。

2.2　三分框架下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的比较

三分框架下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在自我价值来源上, 相较于尊严文化, 都比较重视来自他人与社会的评价, 不过, 荣誉文化中自我认知与他人评价对自我价值都很重要, 而面子文化中自我价值则基本由他人和社会赋予, 由此可推测, 面子文化对他人评价的重视程度要高于荣誉文化。荣誉文化和面子文化在社会结构上差别较大: 虽然两种文化的法律效力都较弱甚至缺席, 但荣誉文化中缺乏相应监管替代品, 主要依靠个体以暴力应对的方式来展现自身实力以达到震慑目的(Kim et al., 2010); 面子文化中社会等级制度严格, 监管惩罚等措施其实不能仅依赖法律, 某种程度上仅依赖法律会降低效率, 更提倡“情理法兼顾”或“合情合理合法” (范忠信　等, 1992), 是一种“情理社会”, 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与情谊, 而这种情谊符合差序格局的等差之爱(翟学伟, 2013; 费孝通, 2011)。

社会等级结构的稳定与否造成两种文化中个体获得荣誉或面子的方式不同: 荣誉更多是在等级结构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竞争得到; 面子更多是在具有稳定且严格的等级社会中经由合作得来(Henry, 2009; Leung & Cohen, 2011)。荣誉文化中的个体必须向外界展现出相应实力, 让他人形成自己对任何威胁都会做出果断且富有侵略性反应的印象, 从而让他人慎重考虑与自己发生竞争或冲突(Uskul et al., 2019)。在面子文化中, 虽然个体也可通过抢夺别人的面子来增加自己的面子, 但一般不鼓励这种做法, 因为它破坏系统的和谐稳定, 还易遭到对方报复, 往往不可持久; 更合理合宜、更具持久效果的做法是: 双方遵守共同礼仪规范, 避免直接冲突, 在互相维护彼此面子、尽量不使对方丢面子的前提下, 增强自己的面子(Ho, 1976; Leung & Cohen, 2011; 汪凤炎, 2019, pp. 537−544)。

在三分框架下, 研究者多在人际互动情境中直接考察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的差异(Aslani et al., 2016; Yao et al., 2017; Krys et al., 2017; Smith et al., 2021)。当遭到挑衅时, 荣誉文化下个体倾向暴力回应, 面子文化下个体倾向回避(Krys et al., 2017); 荣誉文化下个体倾向采取争论、惩罚、恐吓及威胁等竞争性策略, 面子文化下个体倾向采取关心彼此、希望化解分歧及达成双赢等合作性策略(Aslani et al., 2016; Yao et al., 2017)。不过, 在面子文化中, 如果与熟人互动, 回避型行为与合作性策略依然占主导; 但与陌生人或外群体互动时, 则与荣誉文化类似, 竞争性策略变为主导(Aslani et al., 2016)。一方面, 可能因为无论如何对待不属于已有稳定系统的陌生人, 都不会影响内群体和谐与稳定(Yao et al., 2017); 另一方面, 采取较为强势策略对待陌生人, 可获取相对较高的面子或心理地位, 以便于在后续互动中利用相关心理机制获得更多利益。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2310.00188v1

3 作为本土概念的荣誉与面子的内涵与维度及基于此的文化比较

3.1 荣誉的内涵与维度

人类学家 Pitt-Rivers (1965)认为，荣誉包含个体对自身评价的自我形象和其所处社会对其评价的社会形象两部分。自我形象在荣誉文化与尊严文化中受到的重视程度无显著差异，而社会形象在荣誉文化中更受重视(Cross et al., 2014; Rodriguez Mosquera et al., 2008; Uskul et al., 2019)。例如，当要求描述荣誉受到威胁的情形时，土耳其被试(荣誉文化)更多提及他人，如他人的虚假指控让个体社会形象受损的情形，美国北方被试(尊严文化)的回答大多仅与个体自身相关，如个人想法或性格等自我形象受到批评；当让描述感到有荣誉的情形时，土耳其被试也会更多提及受他人嘉奖或表扬的情况(Uskul et al., 2012)。某种程度上，从自我形象与社会形象的两个维度考察荣誉内涵，与三分框架中荣誉文化认为自我价值来源包括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两方面相呼应，人类学家对荣誉内涵的认识也是三分框架提出的重要理论基础(Leung & Cohen, 2011)。

依赖他人评价的社会形象与特定文化情境中提倡的行为守则与社会规范密切相关，而且探究自我形象与社会形象的关系也离不开对荣誉文化中以荣誉守则(honor code)为代表的具体文化实践的细致考察(Rodriguez Mosquera, 2016)。首要荣誉守则包括一些道德行为或良好品质，例如，研究者通过原型分析发现，道德行为是荣誉除自我形象与社会形象外的主要维度，核心是诚实守信(Cross et al., 2014)。由于荣誉文化中法律效力的缺失，报恩与复仇也成为得到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Nisbett & Cohen, 1996)。研究发现，美国南方对报恩与复仇行为的认可呈显著正相关，在美国北方则无关(Leung & Cohen, 2011)。

荣誉守则不仅体现在诚实、守信及回报等道德品质或行为上，还体现在性别守则与捍卫家族声誉方面。男女遵守不同的性别守则：男性应有力量、坚韧、对威胁的迅速反应与报复，和有较强性能力；女性应谦逊、贞洁、性忠诚和服从(Campbell, 1964)。虽然诸多传统与现代社会都存在性别期望，但在荣誉文化中更受重视(Rodriguez Mosquera, 2016; Vandello & Cohen, 2008)，可能因为荣誉文化中个体荣誉与家族成员共享，违反性别守则，特别是贞洁、性忠诚等女性守则，对整个家族而言都是耻辱(Gul et al., 2021)。虽然荣誉文化与尊严文化对性别守则的认可程度是否存在差异还无定论(Vandello et al., 2009)，但在维护家族荣誉的态度上存在显著不同。例如，荣誉文化中多以家庭成员为目标来攻击个体(Uskul et al., 2012)；当家人受到侮辱时个体会感到更愤怒、羞愧及更多关系压力(Rodriguez Mosquera et al., 2016)；个体更认可报复有损父母荣誉的行为(Uskul et al., 2015)。

3.2 面子的内涵与维度

胡先缙(Hu, 1944)首先从社会科学角度对涉及面子的“脸”与“面”进行区分：“脸”主要指个人因道德品质受人敬重而享有的声誉；“面”主要指个体通过社会成就或地位及夸耀而获得的名望。在此基础上，Goffman (1955)认为面子是人类共有的心理现象，“face”指个体成功地获得其向他人声讨的，也是他人认为其应得的社会正向价值，是一种以被认可的社会属性加以描画的自我意象。其后，中西方对面子内涵的认识大体与上述两位相符。例如，研究者大多认可面子包含道德与社会成就(Ho, 1976；金耀基, 1993；汪凤炎, 2019)；礼貌理论、关系管理理论及面子磋商理论等也将面子或“face”视为具有社会意义或人际意义的社会性自我意象(Brown et al., 1978; Oetzel & Ting-Toomey, 2003；陈之昭, 2006)。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能力失败、品德问题、行为失误及性道德等四大丢面子事件(朱瑞玲, 1989)，大体也对应能力与道德两大维度。

道德声誉的“脸”、社会成就的“面”，相对而言强调具有跨情境稳定性的内容(Hu, 1944; Goffman, 1955)，未能突出脸面的情境性和互动性特征，也未能突出社会等级严格，讲关系重和谐的儒家社会特征。Ho (1976)结合儒家社会特征，从角色理论出发，将面子定义为通过恰当的角色表现和被他人接纳的行为操守而得到的他人尊重与恭敬。面子行为表现出挣面子与避免丢面子两个维度：挣面子指个体表现超出社交情境对他的正面期待；丢面子指个体表现低于最低可接受标准，或与个体角色或地位相符的某些重要或基本需求未能得到较好满足(Ho, 1976; Zhang et al., 2011)。文化实践中挣面子行为往往与彰显地位密切相关，一个

ChinaXiv合作期刊

突出表现是不同于维布伦效应(Veblen Effect)所指出的西方奢侈品消费者大多是在获取足够财富前提下，去追求社会认可(Veblen, 1899)，面子文化下奢侈品消费者在并无足够财富支撑时，就已然具有较强烈的彰显地位需求。面子文化下消费者虽收入一般，但仍热衷购买奢侈品或其仿制品，重视品牌远甚于质量，在公共空间这种消费倾向更加明显(Geng et al., 2019; Zhang & Wang, 2019)。身处面子文化的个体还具有强烈避免丢面子动机，因为面子一旦丢失，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困境，为维护面子，在有可能威胁面子的社会困境中，个体宁愿选择向陌生的工具性关系寻求帮助，而不选择熟人(韩贵香, 李美枝, 2011)。丢面子的情绪反应有生气、窘迫难堪、羞愧、自责、沮丧伤心及心情坏等 6 类情绪(朱瑞玲, 1989)，在不同情境中个体情绪反应也随之不同：当因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丢面子时，个体会感到羞愧和尴尬；如果因他人公开指责或嘲笑而丢面子，个体会生气并产生敌对情绪，同时感到更羞愧和尴尬；当与之共享脸面的亲近之人(如家人)在场时，丢面子个体还会感到懊悔与自责(韩贵香, 2010, 2014)。

在严格且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中，中国文化的面子还具有先赋性，面子可由个人在社交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与角色所决定，体现为个体所获面子多少受已有背景关系影响。翟学伟(2013)基于其所提出的脸面观指出，对关系是否重视造成西方“脸面同质”和中国“脸面异质”两种不同面子文化。具体而言，他认为“脸是一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所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形象在社会圈人的心目中所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叫作心理地位” (翟学伟, 2013, p.153)；在西方文化中，脸面无须分开论述，个体对自己形象的塑造和具有的脸资源基本决定其获得的面子资源；在中国文化中，由于注重背景关系，个体在他人心中的面子(心理地位或社会形象)有时并不主要依赖个体的脸(自我形象)，而且多数个体对社会形象的重视程度也高于自身形象(翟学伟, 2013, pp.153−167)。在人治环境下，脸面异质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面子与权威等价，与之配套的就是官本位社会。翟学伟(2013)分析清末至今的 4 个个案指出，在富有官僚主义作风的权力中心意识下，无论高地位者做得正确与否，低地位者都应维护其面子与权威；同时，为了面子，高地位者永远不能认错，一旦认错就意味着自身权威受到质疑从而丢面子。结合中国社会对人情与关系的重视，使得体现权威的面子可以直接作为一种交换资源，也可作为面子共享者实施权力再生产的工具(Hwang, 1987; 翟学伟, 2013)。

3.3　从荣誉与面子内涵维度上比较两种文化

荣誉中包含的自我形象与社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与翟学伟(2013)所定义的“脸”与“面”相呼应，相对于尊严文化，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都比较重视社会形象。不同在于，面子文化中“脸面异质”，即自我形象与社会形象通常并不一致，在社会等级严格且稳定的面子文化中，个体社会形象除包含跨文化普遍性的“facework”与印象整饰成分外(Goffman, 1955)，更多由其社会关系与背景所决定，如生活中人们往往通过社会关系与背景，而非个人品质来决定与他人的交往策略(麦高温, 2006; 翟学伟, 2013)。荣誉文化中社会形象与自我形象相对一致，荣誉文化中个体需要他人认可的社会形象与个体内心想要展现的自我形象相互依赖，例如，人类学家发现荣誉文化中个体行为表现，尽量以符合社会期望的荣誉守则为准，并非出于印象整饰，而是对某种文化规范或道德的内化；研究者通过询问个体当违反荣誉守则时“对自身感觉有多糟”，也发现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一致性较高，体现荣誉文化中两个形象具有较高一致性(Abu-Lughod, 1999; Rodriguez Mosquera, 2016)。

具有道德声誉的“脸” (Hu, 1944)某种程度上与“荣誉守则”中的道德行为相对应，且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对道德行为与良好品质都非常重视，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例如，面子文化更鼓励报恩而不是直接报复，因为它会破坏系统和谐稳定，而且集体或上位者会对相关人员进行惩罚，以避免直接报复的发生(Ho, 1976; 翟学伟, 2013)，但都将“荣誉守则”或“道德脸面”视为做人底线(Handfield & Thrasher, 2019; Hwang & Han, 2010)。不过对社会成就的“面”，两个文化存在差异，某种程度也呼应二者在自我形象与社会形象一致性上的差异。面子文化中个体受到“挣面子”动机的影响，通常会夸大与自我形象不符的自身社会地位与财富以凸显能力，个体提及有失面子的事件时，提及能力失败事件的概率也相对较高(朱瑞玲,

chinaXiv:202310.00188v1

ChinaXiv合作期刊

1989)；而荣誉文化中当个体没有实力保护相应财产时，夸大体现能力的社会成就可能更容易遭受掠夺与引发他人的敌意(Henry, 2009)，而且不切实际的夸大可能还冒着遭受虚荣、不道德等违反荣誉守则的指控(Han & Laurent, 2023)。

与荣誉共享范围主要局限在家族不同，面子共享范围具有情境性和弹性。在商业谈判中，荣誉文化下个体会将家族成员承接达成协议中的部分生意作为前提条件，面子文化与尊严文化在此点上类似，基本遵循在商言商的商业规则，至少在明面上不会以家族额外获利为前提条件(Aslani et al., 2016)。荣誉文化共享范围之所以局限在家族范围，可能是担心家族荣誉的损害会影响个体的社会形象，例如荣誉文化中个体不仅会使用暴力"报复"损害家族荣誉的外群体成员，还会采取掌掴、殴打甚至"荣誉谋杀"等方式"净化"家族内成员，以此来维护自身荣誉(Ashokkumar & Swann, 2022; Rodriguez Mosquera, 2016)。最近研究也发现虽然属于荣誉文化的拉丁美洲社会在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得分也很高，但却与面子文化倾向互依自我不同，更倾向独立自我(Krys et al., 2022)。这就与面子文化所形成以小我或个我所属的不同团体为界限、更包容的互依性"大我"不同(Yang, 2006)。中国人不同范围"大我"可能是造成面子文化具有很强情境性与弹性的主要原因，许烺光(2017)认为中国人是"情境中心"的，倾向以一种怡然自在而有区隔的方式对待周围环境，在每一个不同场合，个体都需找到自己在所属圈子中稳定的位置，同时又须区分对其意义完全不同的内外群体。当面对外群体时，通常个体所属内群体的大我意识被激发，会形成大我面子，个体需要为大我挣(护)面子，大我面子范围从关系密切者面子到整个国家面子不等(王轶楠，杨中芳，2007; Chen & Hwang, 2016)。中国人大我的高互依性与情境中心两个特点，使面子可以视具体情境与任何圈内人共享。

4 总结与展望

4.1 两种视角比较的总结与社会规范的道德化与工具化

结合三分框架与本土概念的研究，分别将前者主要关注的划分依据及文化实践，和后者主要关注的内涵与维度及文化实践的比较结果总结如下(见表 1)。需要指出，两种不同取向研究并非泾渭分明，有一定的呼应与重叠之处。例如，三分框架中自我价值来源与本土概念中自我形象和社会形象就相呼应。基于本土概念研究对三分框架也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例如，三分框架对荣誉文化的认识相对较系统与深入，对面子文化仅关注到合作、谦虚及和谐等特征，未能关注到彰显地位与权威导向等特征。

结合两种取向的相关研究虽让我们对两种文

表 1 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的比较

比较类别		荣誉文化	面子文化
基于三分框架研究			
划分依据	自我价值来源	自我认知与他人评价同等重要	他人评价为主
	社会结构	等级不稳定	等级稳定
文化实践	行为表现	暴力与美德为主且呈正相关	合作谦虚和谐，且暴力与美德无关
	情绪反应	愤怒与羞愧为主且呈正相关	羞愧为主，且愤怒与羞愧无关
	常用互动策略	竞争性策略	合作性策略
基于本土概念研究			
内涵与维度	自我形象与社会形象	较高一致性	通常不一致
	具体维度	道德、性别与家庭荣誉守则	道德与社会成就
文化实践	行为表现	以暴力手段捍卫声誉与地位	彰显地位与权威导向
	共享范围	家族荣誉	情境性与较大弹性
	内外群体区别	内群体与外群体均遵循荣誉守则	内群体注重和谐互相维护避免"丢面子"，外群体竞争以挣面子

chinaXiv:202310.00188v1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2310.00188v1

化的比较有了相对全面的认识, 但仅仅是在文化特征与表现上的简单对照。三分框架虽采用一般性理论在同水平上比较两个文化, 但研究者重点在于解释荣誉文化的特殊性; 基于本土概念的研究虽可以深入各自文化特点, 具有高度文化历史脉络契合性, 但始终是针对自身文化的内在解释, 造成在某些维度上比较起来较牵强或不具比较性。为更好整合两种视角下比较结果, 本文拟采用文化心理学者提出的“一种心智, 多种心态”理念, 其中“心智”是指人类认知过程现实或可能的概念内容的全部, 而“心态”则是指被认知及受激发的“心智”子集, 该理念与宋明理学核心概念“理一分殊”相呼应, 即人不管属于哪一种文化, 都有共同的人性、心智结构与功能, 这种共同性便是“理一”, 而共同的人性、共同的心智结构与功能体现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及同一文化中的个体身上也有一定差别, 结果, 生活在不同文化类型中的人有不同的心态, 生活在同一文化类型中的个体的心态也有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性便是“分殊” (Shweder, 2000; 黄光国, 2012; 汪凤炎, 2019)。结合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的共同性是都较重视社会规范, 且目前用以区别两种文化的测量工具也是基于具体社会规范不同, 本文采用“理一分殊”比较法(魏新东, 汪凤炎, 2019), 从都较重视社会规范的“理一”视角出发来探究它们的“分殊”之处, 一方面可以为三分框架的比较提供有益补充, 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也可解决基于本土概念研究中不具可比性问题。

社会规范通常包含以突出文化群体中多数或典型行为的描述性规范, 和以突出文化群体中得到认可与排斥的行为模式的指令性规范(Cialdini et al., 1991), 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现状更加合理, 多数行为通常都会得到认可, 从“是”变为“应该”, 即描述性规范会向指令性规范转化, 有学者也称这一过程为描述性规范的道德化(陈维扬, 谢天, 2018; Morris & Liu, 2015)。结合上述比较结果和社会规范的相关研究, 可从对社会规范的不同态度上把握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的主要差异: 前者倾向将社会文化规范道德化, 后者倾向将社会文化规范工具化。社会文化规范道德化就是将描述性规范转化为指令性规范, 即认为文化中存在的多数与典型行为, 也是群体成员所应该遵守或必须遵守的行为(Morris & Liu, 2015; Tetlock, 2003), 一个极端案例就是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荣誉谋杀”事件, 移民父亲认为“过于西方化女儿”给家族荣誉带来损害而将其谋杀, 这种行为并不能获得他人或社区的称赞, 反而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Gaynor, 2011), 表明个体并非注重其社会形象, 而是荣誉守则已内化为个体泛情境的道德法则。对荣誉规范的道德化, 也与三分框架研究中发现的暴力与美德正相关相呼应, 因为对荣誉文化而言, 暴力也是一种适应荣誉文化环境的社会规范, 该规范被道德化后与美德属性类似(Handfield & Thrasher, 2019)。此外, 西方文化下社会规范相关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荣誉文化中为何愤怒情绪比较常见: 相对于描述性规范, 违反具有道德属性的指令性规范更容易引起旁观者的愤怒与惩罚(Rozin, 1999)。

面子文化中社会文化规范的工具化主要指将描述性规范甚至指令性规范作为手段与工具, 通过对它们适用范围或群体的灵活解释, 来达到维持关系、彰显地位及维护权威, 进一步促进现有社会等级结构稳定的目的。三分框架及相关测量工具均指出面子文化注重内群体和谐, 不过在中国文化中人们追求和谐有两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 一种是主要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价值性和谐, 信奉君子和而不同, 把和谐作为终极目标, 遇到冲突时, 不会去刻意回避冲突, 而是主张通过积极沟通达成共识; 另一种是工具性和谐, 将和谐作为工具和手段, 希望通过维持表面人际和谐来达成其他目的, 个体会对可能破坏关系的冲突采取回避的态度或做法, 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原则阳奉阴违, 这种和谐观多见于日常生活, 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维持彼此面子, 常常导致“面和心不和” (Leung et al., 2002)。除了和谐这一社会规范外, 谦虚也同样存在工具性谦虚, 除了自我藏拙外, 还有为了凸显与维护互动双方中高地位者的权威, 个体讲谦虚的参照对象往往是在某些方面比自己有优势的强者, 若双方地位平等或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 个体做出谦虚举止的概率会变低, 甚至会表现得目中无人, 毫无谦虚的心态与行为(胡金生, 黄希庭, 2009; 汪凤炎, 2019)。此外, 俗话“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充分体现了社会文化规范的灵活性与工具性, 中国面子文化中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同的人就应该适用不同的规范, 是规范适应人而不是人适应规范(汪新建, 吕小康,

ChinaXiv合作期刊

2009), 规范的不同适用范围和对规范的违背一定程度上是维护高地位者权威或面子的体现, 极端情况就是上位者所说的必须遵守, 造成了权威导向与官本位社会文化特征(翟学伟, 2013)。西方心理学研究也发现, 规范违反者在旁人眼中会显得比较强大, 可以进一步稳固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权威(van Kleef et al., 2011; Anderson & Kilduff, 2009), 一定程度上支持上述观点, 说明这一心理机制也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4.2 研究展望

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采用社会文化规范的题项来区分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的测量工具。一项研究发现, 北京被试在注重家庭声誉的荣誉文化维度上得分反而高于注重内群体和谐的面子文化维度, 导致无法将本属于面子文化的中国群体与荣誉文化区别出来(Smith et al., 2021)。既然对家族声誉和内群体和谐的重视都是面子文化的主要特征, 要想更好区分面子文化与荣誉文化, 需要找出荣誉文化中除重视家族声誉外的其他文化规范, 并且这些规范与面子文化具有显著区别, 而社会规范工具化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关系、彰显地位与维护权威, 体现关系主义在人际互动时一个重要的文化规范: “尊尊” (Hwang, 1987; 费孝通, 2011; 阎云翔, 2006; 翟学伟, 2009), 正如《礼记·中庸》所说: “仁者, 人也, 亲亲为大。义者, 宜也, 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 礼所生也。” 亲亲规范讲究血缘、地缘等关系的亲疏远近, 以纵向权威关系为主的尊尊规范强调要以上位者为尊。某种程度上, 亲亲与重视家族荣誉类似, 但荣誉文化不仅缺乏尊尊规范, 这种文化可能恰恰是低地位者正当反抗的产物。Henry (2009)就发现暴力应对方式源自地位不平等, 即底层个体可能会因为其价值感受到低地位的威胁, 同时地位低下又使得对于这种威胁没有很好的应对方式或选择空间。荣誉文化中个体的暴力应对可能是维护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 因此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所以相对以内群体和谐与家族声誉来区别面子与荣誉文化, 从对尊尊的不同态度上来区分可能更合适, 可从这一角度开发测量工具。

二要探究文化变迁的不同内容对社会规范道德化和工具化的影响。作为社会规范, 无论是道德化还是工具化都会受到现代社会法治进步与法律机构执行效能增强的影响。例如, 一项基于计算建模的研究发现, 当权威机构能够起到监督执法作用时, 荣誉文化中暴力应对机制会被淘汰(Nowak et al., 2016; Cohen et al., 2018); 社会规范工具化某种程度上形成部分人的特权思维, 不过, 随着依法治国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国策, 法律作为现代社会主要规范后, 这一现象受到了广泛批评(汪新建, 吕小康, 2009)。荣誉文化中社会文化规范道德化倾向于将荣誉守则视为一种价值观念, 更可能受文化变迁中教育与先进观念的影响, 例如, 研究发现, 短期的教育培训项目可以有效减少个体的暴力应对, 增强男女平等意识, 弱化对女性性纯洁的固执态度(Cihangir, 2013)。面子文化中社会文化规范工具化主要为了维系社会等级结构稳定, 相对于价值观念变迁, 可能更容易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例如, 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 个体一般拥有长期与固定的交往对象, 面子成为个体在团体中的独有标记, 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随着社会流动加快, 个体互动的对象与参与的团体也变得多样, 这导致将面子作为稳定的权威地位属性的下降, 将面子作为情境性权威地位的属性在上升(Hwang, 1987; Yuki & Schug, 2020; 翟学伟, 2013), 具体可能表现为文化变迁会使挣面子动机逐渐变强, 避免丢面子动机逐渐减弱。基于此, 未来可以探究文化变迁中价值观与某些社会生态变量的变迁对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影响程度的差异, 如验证整体上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上升对荣誉文化影响程度是否高于面子文化(Santos et al., 2017; Varnum & Grossmann, 2017; 蔡华俭 等, 2020); 而诸如关系流动性(Relational Mobility; Thomson et al., 2018)等生态变量的变迁对面子文化的影响程度是否要高于荣誉文化。最后, 文化变迁还可能造成荣誉文化中社会文化规范道德化向工具化的转变。虽然作为道德化的社会规范容易受价值观念影响, 但恰恰是出于对西式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的价值观入侵可能威胁父权控制的担忧, 以“荣誉守则”为借口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及对此的支持态度作为加强控制的手段似乎正在扩大(Brown et al., 2018; Ne'eman-Haviv, 2021), 结合面子文化与荣誉文化在等级结构稳定性上的差异, 未来可进一步探究社会规范道德化向工具化的转变背后机制是否包含贫富差距扩大, 阶层固化等因素的影响(Chan et al., 2021; Piketty & Saez, 2014)。

chinaXiv:202310.00188v1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2310.00188v1

参考文献

蔡华俭, 黄梓航, 林莉, 张明杨, 王潇欧, 朱慧珺, ... 敬一鸣. (2020).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8*(10), 1599−1618.

陈维扬, 谢天. (2018). 社会规范的动态过程. *心理科学进展*, *26*(7), 1284–1293.

陈之昭. (2006). 面子心理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 见: 翟学伟 (编).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二辑) (pp. 107–160).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范忠信, 郑定, 詹学农. (1992). *情理法与中国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 (2011).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韩贵香. (2010). 没面子类型对情绪感受之影响. *教育与心理研究*, *33*(3), 1–23.

韩贵香. (2014). 社会比较情境中表现劣者的没面子感受与情绪: 脸面共享成员在场与情境公开性的影响. *中华辅导与咨商学报*, (41), 1–24.

韩贵香, 李美枝. (2011). 大我的道德脸面受威胁对华人选择求助对象的影响. *本土心理学研究*, (36), 3–32.

胡金生, 黄希庭. (2009). 自谦: 中国人一种重要的行事风格初探. *心理学报*, *41*(9), 842–852.

黄光国. (2012). 跳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本土心理学研究*, (37), 191–210.

金耀基. (1993). “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 见: 杨国枢 (主编). *中国人的心理* (pp. 319–346). 台北: 桂冠出版社.

马蓓, 胡蓓, 侯宇. (2018). 资质过高感对员工创造力的 U 型影响——能力面子压力的中介作用. *南开管理评论*, *21*(5), 150–161.

麦高温. (2006).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朱涛, 倪静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明恩溥. (1998). *中国人的特性* (匡雁鹏 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汪凤炎. (2019). *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 (上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汪新建, 吕小康. (2009). 作为惯习的潜规则——潜规则盛行的文化心理学分析框架.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1*(4), 133–139.

王轶楠, 杨中芳. (2005). 中西方面子研究综述. *心理科学*, *28*(2), 398–401.

王轶楠, 杨中芳. (2007). 小我争(护)面子与大我争面子导向关系之探讨.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33*(6), 20–27.

魏新东, 汪凤炎. (2019). 理一分殊: 中西方自我比较新解. *心理研究*, *12*(2), 99–104.

许烺光. (2017). *中国人与美国人* (沈彩艺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阎云翔. (2006).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社会学研究*, (4), 201–213.

杨国枢, 黄光国, 杨中芳. (2008). *华人本土心理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翟学伟. (2009). 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 局限与理论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 (3), 152–158.

翟学伟. (2013).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瑞玲. (1989). “面子”压力及其因应行为. 见: 杨国枢, 黄光国 (主编).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pp. 177–212).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佐斌. (1997). *中国人的脸与面子*.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Abu-Lughod, L. (1999).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erson, C., & Kilduff, G. J. (2009). The pursuit of status in social group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5), 295–298.

Ashokkumar, A., & Swann, W. B. (2022). Restoring honor by slapping or disowning the daught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21079106

Aslani, S., Ramirez-Marin, J., Brett, J., Yao, J., Semnani-Azad, Z., Zhang, Z.-X., ... Adair, W. (2016). Dignity, face, and honor cultures: A study of negotiation strategy and outcomes in three culture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7*(8), 1178–1201.

Ayers, E. (1984). *Vengeance and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ger, P. L., Berger, B., & Kellner, H. (1973). *The homeless mind: Moder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Boiger, M., Güngör, D., Karasawa, M., & Mesquita, B. (2014). Defending honour, keeping face: Interpersonal affordances of anger and shame in Turkey and Japan. *Cognition and Emotion*, *28*(7), 1255–1269.

Brown, P., Levinson, S. C., & Goody, E. (1978).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R. P., Baughman, K., & Carvallo, M. (2018). Culture, masculine honor, and violence toward wome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4), 538–549.

Campbell, J. K. (1964). *Honour, family, and patron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n, M., Cheung, F., Lau, C., & Ma, T. F. (2021). Global trends in cross-cultural endorsement of social mobility: Evidence from 167 countr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6*(6), 917–932.

Chen, R., & Hwang, K.-K. (2016). Nation, face, and identity: 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face in East Asi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557.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2310.00188v1

Cialdini, R. B., Kallgren, C. A., & Reno, R. R. (1991).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A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norms in human behavior.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4*, 201–234.

Cihangir, S. (2013). Gender specific honor codes and cultural change.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6*(3), 319–333.

Cohen, D., Hernandez, I., Gruschow, K., Nowak, A., Gelfand, M., & Borkowski, W. (2018). Rationally irrational? The ecologies and economics of honor. In A. K. Uskul & S. Oishi (Eds.),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human psychology: Soci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77–1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D., & Leung, A. K.-Y. (2012). Virtue and virility: Governing with honor and the association or dissociation between martial honor and moral character of U.S. presidents, legislators, and justices.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3*(2), 162–171.

Cohen, D., Nisbett, R. E., Bowdle, B. F., & Schwarz, N. (1996). Insult, aggression, and the southern culture of honor: An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5), 945–960.

Cohen, D., & Vandello, J. A. (2004). The paradox of politeness. In M. Anderson (Ed.), *Cultural Shaping of Violence: Victimization, Escalation, Response* (pp. 119–132).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Cross, S., Uskul, A. K., Gerçek-Swing, B., Sunbay, Z., Alozkan, C., Günsoy, C., Ataca, B., Karakitapoglu-Aygün, Z. (2014). Cultural prototypes and dimensions of hon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0*(2), 232–249.

Gaynor, T. (2011, Feb 22). Iraqi guilty of murder in daughter's honor killing.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2/22/us-arizona-iraqi-idUSTRE71L8IT20110222

Geng, L., Yang, Y., & Xu, Y. (2019). To pursue personality or conformity: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ace view on consumers' need for uniqueness. *Psychology & Marketing*, *36*(3), 188–197.

Goffman, E. (1955). On face work. *Psychiatry*, *18*(3), 213–231.

Gul, P., Cross, S. E., & Uskul, A. K. (2021). Implications of culture of honor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practitioners and prevention researcher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6*(3), 502–515.

Han, D. E., & Laurent, S. M. (2023). Beautiful seems good, but perhaps not in every way: Linking attractiveness to moral evaluation through perceived van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4*(2), 264–286.

Handfield, T., & Thrasher, J. (2019). Two of a kind: Are norms of honor a species of morality? *Biology & Philosophy*, *34*(3), 1–21.

Harinck, F., Shafa, S., Ellemers, N., & Beersma, B. (2013). The good news about honor culture: The preference for cooperative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absence of insults.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Research*, *6*(2), 67–78.

Henry, P. (2009). Low-status compensation: A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tatus in cultures of hon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3), 451–466.

Hernandez, I., Cohen, D., Gruschow, K., Nowak, A., Gelfand, M. J., & Borkowski, W. (2022).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unearnest: Opportunists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2), 249–271.

Ho, D. Y. (1976). On the concept of f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4), 867–890.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Hu, H. C. (1944).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6*(1), 45–64.

Hwang, K.-K.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4–974.

Hwang, K.-K., & Han, K. H. (2010). Face and morality in Confucian society. In M. H. Bond (Ed.),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pp. 479–4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im, Y.-H., Cohen, D., & Au, W. (2010). The jury and abjury of my peers: The self in face and dignity cult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6), 904–916.

Krys, K., Vignoles, V. L., de Almeida, I., & Uchida, Y. (2022). Outside the "Cultural Binary": Understanding why Latin American collectivist societies foster independent selve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4), 1166–1187.

Krys, K., Xing, C., Zelenski, J. M., Capaldi, C. A., Lin, Z., & Wojciszke, B. (2017). Punches or punchlines? Honor, face, and dignity cultures encourage different reactions to provocation. *Humor*, *30*(3), 303–322.

Leung, A. K.-Y., & Cohen, D. (2011). Within- and between-culture varia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 cultural logics of honor, face, and dignity cult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3), 507–526.

Leung, K., Koch, P. T., & Lin, L. (2002). A dualistic model of harmon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in Asi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2), 201–220.

Leung, K., & Morris, M. W. (2015). Values, schemas, and norms in the culture–behavior nexus: A situated dynamics framewor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6*(9), 1028–1050.

Maitner, A. T., DeCoster, J., Andersson, P. A., Eriksson, K., Sherbaji, S. Giner-Sorolla, R., ... Wu, J. (2022). Perceptions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2310.00188v1

of emotional functionalit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dignity, face, and honor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53*(3–4), 263–288.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Miller, W. (1993). *Humilia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M. W., & Liu, Z. (2015).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of subjective norms: Reference groups, moralization, adherence, and defianc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10), 1279–1287.

Ne'eman-Haviv, V. (2021). Honor killings in Muslim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modern times: 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 and definition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3*(3), 381–397.

Nisbett, R. E., & Cohen, D. (1996). *Culture of honor: Th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in the South*.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Nowak, A., Gelfand, M. J., Borkowski, W., Cohen, D., & Hernandez, I. (2016). The evolutionary basis of honor cultur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 12–24.

Oetzel, J. G., & Ting-Toomey, S. (2003). Face concerns i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 cross-cultural empirical test of the face negoti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6), 599–624.

Oyserman, D. (2017). Culture three ways: Culture and subcultures within countr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1), 435–463.

Piketty, T., & Saez, E. (2014). Inequality in the long run. *Science*, *344*(6186), 838–843.

Pitt-Rivers, J. (1965). Honor and social status. In J. G. Peristiany (Ed.), *Honor and shame: The values of Mediterranean Society* (pp. 19–7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Rodriguez Mosquera, P. M. (2016). On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morality, masculine, and feminine honor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0*(8), 431–442.

Rodriguez Mosquera, P. M., Fischer, A. H., Manstead, A. S. R., & Zaalberg, R. (2008). Attack, disapproval, or withdrawal? The role of honour in anger and shame responses to being insulted. *Cognition and Emotion*, *22*(8), 1471–1498.

Rodriguez Mosquera, P. M., Manstead, A. S. R., & Fischer, A. H. (2002). Honor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Northern Europ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3*(1), 16–36.

Rozin, P. (1999). The process of moraliz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3), 218–221.

Santos, H. C., Varnum, M. E. W., & Grossmann, I. (2017). Global increases in individualism.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9), 1228–1239.

Schneider, J. (1971). Of vigilance and virgins. *Ethnology*, *10*(1), 1–24.

Shafa, S., Harinck, F., Ellemers, N., & Beersma, B. (2015). Regulating honor in the face of ins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7*, 158–174.

Shweder, R. A. (2000). The psychology of practice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three psycholog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207–222.

Smith, P. B., Easterbrook, M. J., Koc, Y., Lun, V. M.-C., Papastylianou, D., Grigoryan, L., ... Chobthamkit, P. (2021). Is an emphasis on dignity, honor and face more an attribute of individuals or of cultural group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55*(2–3), 95–126.

Stamkou, E., van Kleef, G. A., Homan, A. C., Gelfand, M. J., van de Vijver, F. J. R., van Egmond, M. C., ... Lee, I.-C. (2019). Cultural collectivism and tightness moderate responses to norm violators: Effects on Power perception, moral emotions, and leader suppor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6), 947–964.

Tetlock, P. E. (2003).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Sacred values and taboo cognitio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7), 320–324.

Thomson, R., Yuki, M., Talhelm, T., Schug, J., Kito, M., Ayanian, A. H., ... Visserman, M. L. (2018). Relational mobility predicts social behaviors in 39 countries and is tied to historical farming and threa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5*(29), 7521–7526.

Uskul, A. K., & Cross, S. E. (2019).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honour: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researching honour in Turke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30*(1), 39–73.

Uskul, A. K., & Cross, S. E. (2020). Socio-ecological roots of cultures of honor.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32*, 177–180.

Uskul, A. K., Cross, S. E., Günsoy, C., Gerçek-Swing, B., Alözkan, C., & Ataca, B. (2015). A price to pay: Turkish and Northern American retaliation for threats to personal and family honor. *Aggressive Behavior*, *41*(6), 594–607.

Uskul, A. K., Cross, S. E., Gunsoy, C., & Gul, P. (2019). Cultures of honor. In S. Kitayama & D. Cohen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Uskul, A. K., Cross, S. E., Sunbay, A., Gerçek-Swing, B., & Ataca, B. (2012). Honor bou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honor in Turkey and the Northern U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3*(7), 1131–1151.

Uskul, A. K., Oyserman, D., Schwarz, N., Lee, S. W., & Xu, A. J. (2013). How successful you have been in life depends on the response scale used: The role of cultural

ChinaXiv合作期刊

mindsets in pragmatic inferences drawn from question format. *Social Cognition*, *31*(2), 222–236.
Vandello, J. A., & Cohen, D. (2008). Culture, gender, and men'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2), 652–667.
Vandello, J. A., Cohen, D., Grandon, R., & Franiuk, R. (2009). Stand by your man: Indirect cultural prescriptions for honorable violence and feminine loyalt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0*(1), 81–104.
van Kleef, G. A., Homan, A. C., Finkenauer, C., Gündemir, S., & Stamkou, E. (2011). Breaking the rules to rise to power: How norm violators gain power in the eyes of other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5), 500–507.
Varnum, M. E. W., & Grossmann, I. (2017). Cultural change: The how and the wh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6), 956–972.
Veblen, T.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Vignoles, V. (2018). The "common view", the "cultural binary", and how to move forward.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1*(4), 336–345.
Weber, M. (1997).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Wittgenstein, L. (2009).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Yang, C.-F. (2006).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self. In U. Kim, K. S. Yang, & K. K. Hwang (Eds.),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pp. 327–356). MA: Springer.
Yao, J. J., Ramirez-Marin, J., Brett, J., Aslani, S., & Semnani-Azad, Z. (2017). A measurement model for dignity, face, and honor cultural norm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3*(4), 713–738.
Yuki, M., & Schug, J. (2020).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relational mobilit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32*, 129–132.
Zhang, X.-A., Cao, Q., & Grigoriou, N. (2011). Consciousness of social face: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measuring desire to gain face versus fear of losing fac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1*(2), 129–149.
Zhang, X.-A., & Wang, W. (2019). Face consciousness and conspicuous luxury consump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Marketing Science*, *2*(1), 63–82.

Honor culture and face culture: A comparison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dignity, honor, and face cultural framework and indigenous social theory

WEI Xindong[1,2], ZHANG Kaili[2,3], FU Xurong[4], WANG Fengyan[2,3]
([1]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3]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4]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Honor and face cultur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regulating individual behavior by social expectations and cultural norms. However, the two cultural phenomena differ in several crucial aspects. The new cultural framework, dignity, honor, and face reveals that while both honor culture and face culture place importance on adhering to social norms, honor culture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both self-awareness and external evaluations for self-worth, whereas face culture places more weight on external evaluations. Additionally, honor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an unstable social hierarchy prone to competition, violence, and virtue, while face culture prioritizes modesty,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within a more stable hierarchy. From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the self-image and social image in honor culture are relatively consistent, and honor encompasses moral, gender, and family-related aspects, which may be defended through violence. In contrast, self-image and social image in face culture tend to be incongruent, and face involves morality and social achievement, which is expressed through the dimensions of seeking face and avoiding losing face with an emphasis on status and authority.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moralization and instrumentalization of social norms. Further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new scales based on the moralization and instrumentalization of social norms and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cultural changes on these norms.

Keywords: collectivism, honor, face, dignity, cultural differences

chinaXiv:202310.00188v1